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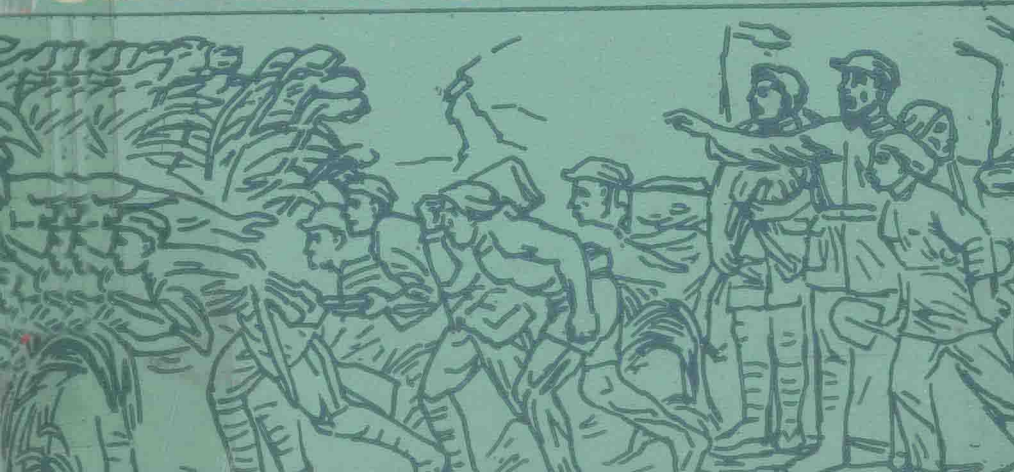


2

1985

近代史 研究

JIN DAI SHI YAN JIU



1979年10月创刊

近代史研究

2

总第26期3月出版

(双月刊)

回忆抗战·····	许德珩 (1)
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封建性·····	杨培新 (41)
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魏明 (66)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和 国共合作策略确立的几个问题·····	姜华宣 (111)
张闻天、萧楚女与《南鸿》周刊·····	程中原 (127)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述论·····	黄友岚 (140)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	李军 (158)
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张静如 马模贞 (171)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	王庆成 (191)
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	王宏斌 (240)
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陈一石 (250)
同盟会成立新论·····	何泽福 (267)
试析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	杨鹏程 (279)
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及资料情况见闻·····	张振鹄 (294)
· 读史札记 ·	
俄界会议时间地点考·····	秦生 (311)
东海关设关考略·····	丁抒明 (314)

回忆抗战*

许德珩

“九·一八”以来的活动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我和君展带着两个孩子许鹿希、许仲明来到北平。

一九三一年九月，北京大学刚刚开学还未上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都要求抵抗，可是蒋介石却只想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抗日，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一枪不放，撤退到山海关以内。日军迅速地扩大侵略，不到五天，就几乎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总共不过三个多月，整个东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断送了，三千万东北同胞流离失所，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张学良的东北军逃进关内，驻扎北平。日本控制了东北三省以后，便展开其吞并满、蒙的第二步计划，节节进逼热河，长城告急，北平大震。张学良对日不抵抗，唯蒋介石之命是听；蒋介石为利用他，还任命他为副统帅。此时，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退出了北平，而蒋介石的力量则扩展了进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决议，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上课之前，北大进步同学千家驹、张百川等来我家，约我到北大作时事讲演。我遂到北大作了一次

• 这是许德珩同志的长篇回忆录《革命风云七十年》的一部分。

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讲演，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南京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同学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受到很大的激发。随后，师大的同学也请我去讲演，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九月底，南京、上海的学生群集南京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并捣毁南京政府的外交部，殴打外交部长王正廷。十月间，上海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又往南京请愿示威。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示威团二百余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适逢国民党开中央临时常会，蔡元培先生与陈铭枢被推为代表与学生相见，蔡先生没有一句责备学生的话。请愿示威的学生当中有北大学生陆地（即陆平）、刘导生，师大学生李续纲、张洁清等同志。十七日，当平、津、沪、汉、广州、济南等地，三万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军警竟向学生开枪冲杀，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杀死学生三十余人，伤百余人，被捕甚多。这时，上海学生悲愤地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民众法庭公审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请愿示威，捣毁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党部及地方政府。

南京政府竭力压制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十月间，蒋介石特地召见北大教授胡适、丁文江，对“大局有所垂询”。不久，胡适便同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了《独立评论》，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辩护，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积极地准备侵犯上海，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进攻上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驻防上海的蒋光鼐、蔡廷锴将军所部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英勇奋起抗击，顶住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抱着“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

心，把日本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万余，主帅白川大将在虹口公园被我军打瞎了一只眼睛，挫败了他的骄横气焰。可是蒋介石却极为不满，当即派了以为是自己嫡系的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到上海来监视十九路军。谁知第五军一到上海，就与十九路军合在一起共同抗日，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时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抗日情绪高昂，北大学生组织了慰问团到上海慰问我抗日军队。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于上海军民的抗战，不仅不予支援，反而千方百计地破坏，对日军则无耻地妥协，使日军的无理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就在五月五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卖了淞沪抗日的军民。最后竟然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去“剿共”，迫使该军从上海撤退。上海的抗战就这样由胜利转向失败。

蒋介石失掉人心，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曾经一度“下野”。重新上台后，鉴于他的独裁统治还不稳固，特别是他在国民党内，还相当孤立，在取得了极端反共亲日派的汪精卫派合作后，他就致力于强化法西斯的统治机构和独裁制度，以便更加紧进攻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破坏抗日武装的发动，以及压迫国民党内的各反对派。民族英雄邓演达，是蒋汪最惧怕的黄浦军事领导人，就在汪、蒋合作对日投降之初，被蒋介石杀害了。

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我在课余之暇仍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天，陈公博忽然来到北平，并到我家看我。这时，汪、蒋已经合作，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公博做了实业部长。陈来劝我不要教书，刚坐下就说：老兄，不要教书了吧！本来国家内忧外患，爱国人士正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以救国家民族之危亡。我此时还在教书，是很惭愧的。可是，“不要教书了吧！”这句话出自陈公博之口，立时使我想起在上海，他得了宋子文十万大洋，把我们出卖的事情，不由得怒气上冲，我便转问他：不教书做什么？做官僚，做卖国贼？还是做蒋介石的打手？邓演达上了你们的当，受了骗，现在又来骗我？士各有志，勿相强也，你去干你

的好了。我并且嬉笑怒骂地说了一些讥讽话，说得他面红耳赤，很不愉快地走了。他走后，我气愤得久久不得平静。

一九三二年暑假开学后，宪兵第三团调来北平。宪兵三团是蒋介石仿效法西斯的办法，设立的特务机构，并以他的侄子、特务头子蒋孝先为团长。这次调来北平，是专门对付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的。这时频传学生有被捕者，也有夜间睡在寝室被叫走即无下落者，一直闹了好久。十二月初，师大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教授侯外庐于同一天失踪，他们的家属到处寻找了好几天，不知下落，十分着急。我预感事态发展有些不妙，但也只好由它去。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五时，我尚未起床，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家伙闯进了我的卧室。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蒋孝先，年纪三十许，手执手枪说：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要请你去谈谈。我立即坐起来问：你们是哪里的？他说：不要问！赶快穿好衣服。我即穿好衣服，未及洗脸就一同下楼。楼下的房间里挤满了军警。有辆小汽车停在门口，两个宪兵拥我上车，然后一边坐一个，手枪对着我，街道两旁也布满了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问：你们这是为着什么？一个家伙说：不要问，到了就知道了！到了宪兵三团，我就被关进监狱。

我被捕之后，他们就着手抄我的家。先把我的五岁女孩和四岁男孩锁在一间冷冰冰的空汽车房里。寒冬腊月，气温在零下十多度，四五的小孩关进没有火的冷冰冰的车房，整整关了一上午，后来都生病了。我的女孩许鹿希从此得了气喘病，害了她一生。接着就抄我的书房、卧室各处。他们断定我家藏有枪枝弹药，也许还藏着卢布，但毫无所获。于是就抄我的书籍，因为书多而他们的知识又贫乏得可怜，只好把红色封面的书以及“五四”以来我的各种照片和一些重要文稿抄装一卡车拉走了。时届中午，他们拟将我的书房封起来，等午后再来查抄，于是打电话请示他们的上司。那时的电话是叫号码的，不是自动的。君展思想甚为机敏，在特务打电话报号码时，她悄悄地把他们的电话号码

记下来，等他们走后，她按电话号码从电话簿上查到了我关押在什么地方。君展立即换上一身很讲究的服装，叫来一辆上等的出租汽车，偕同我家的女服务员坐上汽车，并多给司机一些钱，要他昂然驶入特务处所，不要理会门岗，照直开进。果然，门岗看到势派不小，不敢拦阻，汽车一直开进了内部的值班房。君展从“犯人”名册上一翻，首先就见到了我的名字，再翻，又见到了马哲民、侯外庐等人的名字。就这样找到了我被羁押的地方。君展出来后，就打电话把消息通知各报馆和学校等处，特别通知了《世界日报》社的萨空了同志，因为他素来主持正义，又和我们熟悉，于是敌人的阴谋被暴露了。

第二天，各报用斗大的字报道了我们三人被捕的消息，北平各校及社会舆论大哗。不两天，消息就传遍了国内外。各方面发来了许多慰问电。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诸先生，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一个进步团体。其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目自由，主席为宋庆龄，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杏佛。我被捕后，君展立即打电报给蔡元培先生，报告此事。蔡先生除复电慰问外，并联合宋庆龄、杨杏佛等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营救我们的代电，电文如下：

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蒋常务委员介石先生、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先生（院长汪精卫请假）、北平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先生公鉴：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坐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

重民权而张公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即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同启。十二月十七日（见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申报》）。

杨杏佛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北平。杨到北平大学后随即到我家里，与君展一起来监狱看我，多所慰问。我对杨说：我们是爱国运动。政府不打敌人，专打人民。若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若爱国无罪，他们应当向我赔罪。……听说，北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等校学生已准备为此罢课。而张学良自东北易帜以后，唯蒋之命是听，但“九·一八”后国恨家仇，使他思想逐渐有所变化。此时对开罪于北平教育界，有所顾忌，若各校真的罢起课来，恐更不好收拾。所以他趁杨杏佛先生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北来之际，顺水推舟，将我释放，以安人心。十二月十九日午间，他们在牢房设了四盘菜，一个火锅，请我吃饭，算是赔罪。不一刻杨杏佛先生同北大法学院周炳琳先生来接我出狱，我愤极，把饭桌推翻，随即同杨杏佛先生等出了狱。

我出狱后，在二十九日致蔡元培先生信中述及被捕情况。我在信中说：本月十三日，“被军事当局非法逮捕。事先并无任何通知于学校，事后询问缘由，仅知是‘九·一八’事变后常作公开讲演之故，并无其它罪名。”“逮捕时，寓中横被搜查，损失中西文书籍译稿、著稿甚多，课余成绩丧失过半。此中举动，昔日北洋军阀不忍为之，而乃见于今日，殊令人无穷之感也。珩现虽出狱，然精神甚苦闷，多承先生及孙夫人关怀，感惭交并。然此乃今日中国社会之整个的问题，非个人之问题也。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狱中尚有十四岁小学生，十六、七岁中学生，状至可悯。谁无子女，谁无弟兄，而乃不为社会爱惜人如此，可为痛哭者也。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

民气。学生为一愤世嫉俗者，只求问心得过，虽受任何处罚无怨也。”就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蔡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义，招待中外记者，为保存民族元气，保障民权，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我同蔡先生的往来，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中断了三年多，此时方行恢复。

我出狱不久，杨杏佛先生就来找我，要我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我对他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先生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萨空了先生也以记者的身分参加了这个组织。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选出我和胡适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后胡适~~因~~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攻击民权保障同盟，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被开除会籍。

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先生惨遭特务暗杀，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令人发指。杏佛先生被刺的消息传到北平时，我悲愤填膺，不能自己，曾写《哭杨杏佛先生》古诗一首以志哀：

天暗暗兮沪水寒！

杨公被殁兮我心悲伤！

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

此仇必报兮时间不长。

百倍以偿兮何时？

宋蔡心情兮可想！

泪落京华兮此日。

雪耻到来兮地覆天翻！

我出狱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冯玉祥将军突然派邓哲熙、李兴中两先生来到我家，约我去张家口“讲学”，并已买好了火车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我即同他们一起去了张家口。我与冯玉祥将军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讲述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遇到了赖亚力（兴治）和张勃川（百川）等同志，他们都是北

大刚毕业的学生。我并且见到了吉鸿昌将军。因为特务还很注意我的行动，不便久留，不几日我就秘密地回到北平。我走后不久，吉鸿昌将军即联合冯玉祥将军等组成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我在这个抗日同盟宣言上签了名，算是参加了这次抗日反蒋运动。此次战役极为激烈，主要的领导人是吉鸿昌将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一九三三年九月，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遭到失败，吉鸿昌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捕，不久即英勇就义。我至今仍然怀念这位抗日的民族英雄，当时悼以一联，词如下：

仗义灭贼豪情，君死更增血恨；

为国捐躯惨痛，我生必报深仇。

回到北平以后，我即致函北大当局请假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把历年教书的讲义重新加以整理，先写出了《社会学讲话》上卷，约三十多万字，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开办的好望书店出版。继而着手整理我所教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及《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三三年九月，我本想从此不教书了，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哪知北大的聘书又送来了，同学们也纷纷到我家希望我不要辞职。这时，日寇的侵略，日益猖獗，时局日坏，形势的发展不允许闭户治学，所以休息了九个多月之后，我于当年十月复投入教书和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从“一二·九”到“西安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又强划冀东各县为非武装区，继而进一步地企图吞并华北五省，于是在一九三五年发动了新的进攻。

一九三五年六月，何应钦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这个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从此，在平津，日寇的坦克纵横街衢，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向人民示威，扰乱人心。荷枪实弹的日军，在

大街上横冲直闯，使日常生活不得安宁。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在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平津的学生再不能安心地读书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此严重时刻，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北上抗日了。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平津的爱国师生，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救亡运动的序幕。党的《八一宣言》，是“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动力。

《八一宣言》发表后，华北的知识界积极响应，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进行传播。我们读到宣言，犹如在难明的长夜获得曙光一般，高兴得不能成寐。这时，徐冰同志在党的指示下，先后在太原、北平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和“华北民众救亡同盟”等统一战线组织，努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北平的高等院校里的一些进步教授如马叙伦、张友渔、许德珩、黄松龄、劳君展、齐燕铭、管彤（张致祥）、寸树声等，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冒着解聘和坐牢的风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思想。在此期间，东北大学迁到北平。我应东北大学之聘，讲了一门时事课，目的在于鼓舞抗日救亡。下课前，学生领导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抗日救亡歌曲，血泪凝成的歌声，撼动着师生们的心弦。这歌声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控诉，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抗议，甚为激动人心！

一九三五年八月间，徐冰同志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教授，其中有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劳君展、许德

珩、吴觉先等，在玉泉山便餐聚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建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恰巧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来找我。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大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一节作了分工，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我负责（以后北大负责联系的增加了马叙伦、尚仲衣教授），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以后增加了潘怀素），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平大法商学院及平大各学院由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徐冰、张晓梅负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凝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何梅协定》签订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并不感到满足，便进一步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成立“华北国”。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噤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二十二个县。后来又煽动和支持内蒙古的民族败类，反动上层分子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组织伪内蒙古自治军政府，并指挥伪军向绥北、察北等地进犯。南京政府为了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日本化）的要求，便在十二月初指派宋哲元及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姚震等十六人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就使华北名存实亡。从此，大小汉奸公开在平、津结队游行，耀武扬威，叫嚣“华北五省独立”，而日本宪兵、国民党特务则到处逮捕抗日人士，亡国的惨状笼罩着整个华北。

一天，忽然有一位叫刘定五号治州的人来找我。此人原是旧国会议员，当时是宋哲元的最高顾问，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关系，他和我见过面。这时他来找我，显然是做宋哲元的说客，要我们不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但是，经我与之深谈，他有了转变，我就趁机要他做宋哲元的工作，劝宋哲元站在人民一

边，救亡图存，一致对外。刘愿意去说服。到了十二月七日，全城纷传南京政府已经批准，准备于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新的政府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任委员长。大家看得很清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不过表面做个幌子，以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实质上是把冀察两省作了“睦邻”的礼物。

北大的进步力量虽然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学生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埋头读书。但在祖国危急之秋，学生运动又有了新的转机。一九三五年秋，山东省发生大水灾，北大由一些学生和教授发起成立了水灾赈济会。这时，党的北大地方支部也重新建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就是党在各校赈济会的基础上，领导成立的。

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组织决定，首先以请愿的斗争方式充分发动群众，然后由请愿转向示威，掀起抗日反蒋的强大运动，推动华北以至全国抗日高潮的迅速到来。十二月八日，党领导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十二月九日举行请愿的决定。北平各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北平各学校教职员救亡会”，并发表了署名的宣言。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平国立、私立十五所大学的学生和中学学生共万余人，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爱国学生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冲破了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雄壮口号，震撼了北平古城。学生派出代表，向南京政府派到北平安排“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何应钦，提出了真正表达中国人民意志的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应钦的代表根本不理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对代表胡诌一通“读书救国”的

滥调。这使爱国学生愤怒到了极点，指挥部决定立即转入示威斗争，于是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长安街进发。

队伍来到王府井大街，这时宋哲元已调来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手执大刀、木棍，布满了人行道旁，水龙带也对准学生准备冲击。他们拒绝学生代表的交涉，不准队伍通过。当英勇的学生一齐往前冲时，反动派的水龙开动了，滴水成冰，冰如刀割，反动军警又挥动大刀、木棍，乱砍乱杀。我和君展等都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我们的大衣、棉衣，均被水龙带喷射湿透，很快就冻成了冰。但是大家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暴行吓倒，仍然昂首阔步地继续前进。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学生有一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指挥部带领队伍撤到了北河沿北大三院。市学联总结了一天的斗争，示威学生一致作出了“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共同救亡”、“十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准备最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等决议。

十二月九日那一天，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反动当局把西直门、阜成门的城门紧闭，铁路停止通行，无法进城参加示威。十二月十四日，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学生代表陈明绍同志由徐冰同志陪同，约我当天晚上去清华讲演，介绍“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情况。劳君展同志陪我一同前往。谁知我们一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两派学生就闹了起来，一派学生要我讲演，一派学生不要我讲演。我既然来了，就只有坐在台上不动，让他们去闹，闹完了，我还是照常讲演。我在讲话中控诉了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歌颂了同学们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同学们的情绪甚为高昂。讲完之后，我和君展到张申府家里小坐，随即乘车进城。我们回到家里刚一坐下，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电话就来了。君展替我接的电话。蒋梦麟说：刚才得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电话，说你们北大的许教授来我们清华放了一把火，学生们决定要上街游行了。蒋梦麟大有责备之意，君展义正辞严地给顶了回去。

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成立的日子。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全市学生爱国游行总示威。城内各校分为三队，城外各校集为一队，突破反动军警的阻截，各队共一万余人，分途到达天桥集合，居民聚集者也有一万多人，宣布召开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有大中学生和各界市民。我和君展等也参加了游行。学生市民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卖国外交！”声震云霄，气壮山河。路旁人山人海，观者塞途，许多群众为学生的爱国热情而感动落泪。几万群众抗日爱国热情驱散了冬季的严寒，连路旁的行人也争先传阅学生散发的传单，许多群众还怒斥军警，抗议他们对学生的迫害。

反动当局不仅动员了全城军警，而且加派了两团武装军队，加紧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被棍棒打伤的有一百多人。爱国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再一次表示了他们对中国的革命起着重要作用，而共产党员则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北平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慰问参加爱国运动的各校同学，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群众强大威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最先清算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给汉奸卖国贼和日寇以极大的打击。它吹起了伟大民族解放的号角，并使此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二·九”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到来。

我当时为“一二·九”爱国运动写了一首纪念诗，抄录如下：

救国毋忘“一二·九”，
冰天雪地万人吼。

面对大刀水龙头，
不屈不挠斗群丑。
“华北政委会”取消，
万众一心胜利有。
扩大斗争到全国，
爱国精神永不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我们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为北平学生运动发表宣言，宣言是在徐冰同志的主持下，由我们起草的，内容摘要如下：

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华北是在南京政府领导下被无耻的官僚政客们所“合法地”出卖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不过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主持的傀儡组织。一切秘密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都正在这种掩护下进行着。

……

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人的“意气”！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九日和十六日北平三万多青年他们在寒风凛冽刀枪林立中反对出卖华北的游行，不是代表全国被压迫民众一致对外的先声吗？不是华北最前进最觉悟的群众对敌人的示威吗？军警当局对他们所施的那种卑劣的残酷的高压，只会增加我们对汉奸统治的愤怒，决不会减少革命青年的勇气，决不能阻止民众抗日联合战线的发展！

……民众们，同胞们！在这种民众与汉奸斗争严重局面之下，单只同情于学生运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唤起广大的民众，一致地援助它，发展它！

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更横暴的侵略，更

残酷的屠杀，更巧妙的出卖，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应该起来斗争。自由和奴隶，中间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们必须发展北平学生英勇的斗争精神，一致武装起来，再接再厉地：

拥护北平学生英勇的救亡运动，并使它扩大到劳苦民众和曾经在喜峰口抗日的士兵中去，以形成全国革命的民族战争！

.....

这篇宣言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出版的《北大周刊》第二册上。

一九三六年初，北平文化界由我和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于一月二十七日假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礼堂举行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首由白鹏飞报告救国会筹备经过，继由主席团代表马叙伦报告组织此会之意义，旋即进行讨论，通过了会章及我们起草的第一次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九一八以来，丧失了东三省，断送了热河，民众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国策下，忍气吞声地待了三、四年，以为政府应该收复失地，保守疆土，奈何东北四省领土未曾收复一寸，整个的华北又将拱手让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冀东的伪组织反而扩大，由外力策动建立了名存实亡的华北政权，敌人所派的无名总监，已将常驻天津，监视着接收冀察，更进而囊括华北。华北民众，全国的民众，是否仍旧保持着在皇帝统治时代不瞪一眼的态度，坐以待亡？

不！.....真正的民意，正在准备着全体武装，为最后的奋斗。所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便如电掣雷奔地起来；各地学生运动也如崩山倒海地继续发展。.....

事实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等候着做顺民以外，只有起来